

在商言商

冯筱才
著

描摹近代商人共相
读懂真实政商关系

政治变局中的
江浙商人

Business is Business:
the Merchants of
Zhejiang and Jiangsu in
Political Changes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在商言商

冯筱才
著

政治变局中的 江浙商人

Business is Business:

the Merchants of
Zhejiang and Jiangsu in
Political Changes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冯筱才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8

ISBN 978-7-5444-9149-5

I. ①在… II. ①冯… III. ①商人—研究—江苏—近代②商人—研究—浙江—近代 IV. ①F7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44622号



责任编辑 戴燕玲

封面设计 陆 弦

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 冯筱才 著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9149-5/K·0061

定 价 59.80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本社调换 电话:021-64377165

第一章 绪论

- 003 商人与政治：一个老问题
- 007 谁是商人？
- 009 从“上海”到“江浙”
- 011 什么是“政治”？
- 014 “产权与秩序”：一个新的研究框架

第二章 晚清以降江浙区域社会变迁中的商人

- 025 晚清国内政治、经济的演化
- 027 从“轻商”到“重商”：商人地位的嬗变
- 038 经济民族主义与私有产权制度
- 051 晚清社会变迁中的江浙商人

第三章 有秩序的“革命”：辛亥革命前后江浙商人政治行动的重新考察

- 086 商人对革命的态度：一个事前的分析
- 094 革命爆发：商人的反应与“参与”
- 108 革命的“背离”

第四章 江浙商人与地区社会变乱：以“齐卢之战”为中心

- 142 江浙商人与东南和平运动：1920～1924年

- 150 战乱中江浙商人的损失
- 161 江浙战争的爆发与商人的应对
- 176 商人与战事结束及善后

第五章 从“五四”到“五卅”：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江浙商人

- 201 辛亥革命后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
- 205 运动发生与商人罢市
- 216 罢市的维持与结束
- 223 抵货运动的开展
- 231 抵货运动中各方利益分合与态度变化
- 244 抵货运动中矛盾的激化与运动的结束

第六章 民初江浙商人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地位

- 284 动荡政治中的商人应变
- 297 “责任群体”与社会秩序的维护
- 307 官商关系与民初江浙商人的政治地位

第七章 结论

- 325 产权、商人与政府：1927年前后的比较
- 330 秩序：商人的不绝追求
- 333 在商言商：“资产阶级”幻影背后的近世中国商人实像
- 340 参考文献
- 363 再版后记

表格目录

- 031 表1 晚清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中各项税收的比例
- 097 表2 辛亥革命前后江浙两省商民组织的自卫团体（上海除外）
- 103 表3 辛亥革命后江浙地区商人参加地方政权
- 153 表4 1924年江浙战争期间商人被勒索事例
- 158 表5 江浙战争期间公债变动情形
- 162 表6 江浙战争期间江浙地区商民武装自卫团体一览
- 170 表7 江浙战争期间江浙商民举办难民收容所一览
- 206 表8 五四运动期间江浙各地的罢市
- 228 表9 五四运动期间江苏省各地焚毁商人日货一览表
- 232 表10 五四、五卅运动中江浙两省国货公司、国货商场的创办
- 237 表11 五四运动期间学生贩卖团的组织
- 257 表12 五四运动后期江苏地方商人抵制学生的罢市

第一章 绪 论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在武昌起事。这个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江苏、浙江两省的大小城镇。不到一个月，白旗便在上海、苏州、杭州、宁波、嘉兴、无锡、常熟等许多城市的大街上挂了起来，地方商绅在这些地方的政治变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各地军政府的领导班子，包括了不少原本在地方上享有权威的商人。当时革命党人的报纸对这些商人的政治觉悟曾大唱赞歌，许多后世学者也表扬江浙商人在关键时刻抛弃了“在商言商”的陋习，勇敢地参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革命。

8年后的初夏，白旗又在江浙一些城镇的街市上挂了起来，不过这次行动据说是店家们为遥远的京城里发生的一桩外交事件主动罢市。街道上一队队高呼口号的学生在游行，两旁的店铺门板上贴满了“救国停市”之类的字条。在一些评论家的眼里，这些天天与算盘、账簿打交道的生意人无疑是融入了汹涌的民众爱国潮流之中。

似乎从这时开始，商人们的政治自觉性突然提高了。五光十色的变幻时局中，商人俨然成为一种极有权威的政治势力，为各方要人们所重视。1923年6月，在上海总商会富丽堂皇的会议大厅里，商界巨头们正在讨论一个“历史性”的

议题——成立民治委员会。这个举动立即产生了轰动性的新闻效应，许多报纸的主笔都在为上海商人们的政治觉悟大声叫好，时任中共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也曾用热情洋溢的笔调对商人的行动予以积极的肯定。

商人的地位似乎越来越重要了。次年10月，上海的商人领袖与满身戎装的军人围坐在一个会议桌前，这些刚经过一场鏖战的将领们正在接受总商会的调解。不久，各路军队陆续撤出上海，北京政府下令由总商会接管兵工厂，并准备正式成立“淞沪商埠自治市”。“商人政府”似乎真的要在上海实现了。

不到半年，因为南京路上发生的一起枪杀案，商人大罢市很快又在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被发动起来，总商会也成为全市总罢工运动的经济靠山。上海商人的“革命性”连远在莫斯科的苏联共产党领袖们也为之惊叹不已，甚至因此影响到其重大的政治决定。

在这些历史场景面前，我们似乎不能不得出一个印象：江浙地区的商人正在一步步走向政治化，“在商言商”的古训也已为这些商人们所抛弃，他们在政治方面的行动正愈来愈主动积极。然而，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虽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本身未必造成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根本性的转变，但这场革命却是中国近世最重要的政治变动之一。这场革命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1911年这一时点，更在于此后发生的一切。辛亥之后，中国政治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社会秩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职业的特性，商人对社会变动往往较其他社会阶层更为敏感。那么，这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力对江浙地区的商人们造成了什么样的

冲击呢？他们又是如何来应对这些外在的政治变动呢？今天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江浙商人与民初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呢？

商人与政治：一个老问题

“商人与政治”一直是国内外中国近代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大陆，较早的研究者主要是将其置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框架中加以讨论：其一，着重分析政治运动的“阶级基础”。如立宪运动的阶级基础、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其二，将商人划为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认为阶级属性决定政治立场。其三，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如软弱性、妥协性、两面性）及其根源（如“封建脱胎”说、“工业弱小”说、“政治幼稚”说等）。

1980年代后，关于中国近世商人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学者们突破以批判为主的论述模式，试图对“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在近代历史中的表现给予客观评价，其研究工作多侧重于讨论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或者按照资产阶级的阶层分析法将多数商人纳入“民族资产阶级”的范围，与“大资产阶级”或者“买办阶级”作些区分。稍后，又开始对“买办阶级”及“大资产阶级”进行分析，尽量将这些概念具体化，避免政治化的定性分析。这些研究多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史的角度来进行，政治色彩仍很浓。对于晚清商人的研究，更是被置于辛亥革命史的框架中进行。

作为对资产阶级集团分析的一种路径，1980年前后，大陆开始出现商会史研究热潮，但其分析的动机多为了更加清

晰地了解资产阶级的政治动向，时段上、价值取向上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此前讲“民族资产阶级”，其所指多停留在“维新派”“革命派”以及知识精英的身上，真正的商人反而被淡忘。商会史的研究者将“民族资产阶级”的主体重新提出，从而根据新的基础来判断“民族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特点。在这些研究者的笔下，商会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独立阶级队伍的形成”，成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地位与利益，以及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斗争的重要场所”。论者们一方面承认商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有一定的促进经济发展的“进步性”，体现了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但认为它无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制约，政治上表现出很多的“软弱性”。〔1〕

进入1990年代，学者们开始在研究中尝试着引用各种新的理论框架与概念，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了进展：其一，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学者们认为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开始抬头，由“在商言商”向“在商言政”转变。其二，商人与政府之间关系。论者多以“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需求作为分析其与政府关系的关键，把商人与政府的离合作为判断其政治独立性或进步与否的标尺。其三，商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多数学者认为在晚清至民初期间，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呈“M”形，商人们在1860年代后政治上日趋活跃，至清末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达到第一个高峰。后来由于反对“二次革命”政治上出现倒退。1915年后，政局日益混乱，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又呈上升势头，到1920年代中期，达到第二个高峰。但在国民党上台后，商人受到压榨，最终丧失了“政治自主性”。〔2〕

在中国大陆以外，自1960年代起，一些学者即在从事为中国“资产阶级”恢复名誉的工作，强调商人对“国家现代化建设”所作的贡献，或者以“对抗论”来重新阐释商人与政府之关系。官商关系长久以来都是他们讨论的焦点。^[3]其中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与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的著作主要讨论的即是1911～1927年的政商关系。白氏在其著作中将1911～1937年视为“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代”，“资产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势崛起，取得了一系列的“经济奇迹”，政治上也日益觉悟，并曾试图去建立一个自己的政权。然而最后却归于失败，“资产阶级”走上了依附国民党的道路。而傅士卓的著作，主要从上海的商业组织入手，去探究晚清至国民党上台之间商人与政治关系的演化。他认为上海的商人自晚清后，由于观念的变化，组织的创建，自治运动的参与，日益表现出政治方面的发展，五卅运动则代表“商人组织政治化”的一个高峰。1927年后，国民党人曾试图以党化商民组织整合上海商人，但遭到反抗，最终双方妥协，形成一种国家统合主义（State Corporatism）。李达嘉在其以“商人与政治”为题的博士论文中，认为自1895～1914年，“近代中国商人政治意识逐渐兴起”，但是面对政治强权，最终只有无奈地被压制。^[4]

历史研究自应围绕“问题”而展开，往往什么样的问题便决定有什么样的历史叙述与解释。以“商人与政治”的题目而论，学者们关注的重心虽然不一，但是所提出的问题似乎却相差不大，基本上围绕着“商人为什么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或者“中国近代商人为什么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等问题展开的。^[5]这些问题其实均在预设中国近

世的商人群体有政治企图，但是由于自身的力量虚弱或者强权的压制而最终未能实现。然而，中国近世商人真的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吗？他们真的想构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吗？

长期以来，中外学者似乎都忽略了以下问题：政治变迁对商人的观念、行为造成了何种影响？商人作出过何种反应？此种反应成效何如？又如何影响到政治变革的过程？就“商人与政治”的议题而言，如不从商人本身的角度出发，其视野上既有盲点，论述也易流于牵强。对于商人而言，政治意识的抬升与降低以及政治参与的程度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力的冲击如何影响到社会秩序的变动，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又该如何因应这些变数。

其实，上面许多学者在研究“商人与政治”时，多以上海作为其举证的中心。但从政治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是极难观察到商人的政治动向的。政治迷雾中，哪些是商人的“做秀”？哪些又是他们的真意？左右商人行为的种种因素，哪些是上海特有的，哪些又是在别处可遇到的？不作认真深入的考察是很难发现的。

笔者认为，要看清中国近世商人的政治观念与行为，仅从上海着眼是远远不够的。商人的特性，固然有地域的差别，但在职业范围内，商人的共性确实是存在的。如何找出这些共性，就需要我们将观察的视野放开阔一些。即使要了解上海商人的政治旨趣，笔者认为亦应将上海放在江浙地区之中作一比较，而不能把它“典型化”。要判断商人的政治动向，首先便需要有一个恰当的视点。

其次，更不能以预设的政治化框架去套商人的言行。论者往往先预设商人有政治志向，或者与“国家”相对立，然

后便将论述重心放在分析为何此种意愿不能实现。但此种前提本身即需要证明。有时我们可以发现偏激的政治倾向充满于论者的文字之中，对党派政治或“军阀”个人的厌恶，致使分析流于粗糙。虽然论者有时可能找到一些例子来作局部证明，但均未能明了事实的全部。为什么我们不能先放弃预设立场，或者避免使用一些容易引起争论的概念（如“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从商人所经历的事实本身出发去作适度的分析呢？

再次，论者往往没有将研究主体作适度界定。在他们的研究中，民族主义运动与革命、战争等没有区别，对内与对外混为一体。所谓“资产阶级”，也不太分商人与“知识分子”甚或“党人”。论者的笔下，他们主要关注的所谓“政治”其实主要以“政治作为”为核心，诸如商人的政治参与、政治意识的觉悟甚至所谓“自由主义”等。他们笔下的“商人”失去了商人的本来面貌，成为“泛政治化”的“虚拟形象”，但是这根本不是民初中国商人的主要形象。由于此种严重偏狭，我们很难从他们的著述中找到民初商人对政治的真实反应。

谁是商人？

“商人”一词，在近代汉语中含义甚广，几乎涵括了各种与民生相关行业的经营者。国内外学者在对其进行具体研究时，采用的概念往往并不都是“商人”二字，而是随着考察时代的更替有所变化。如于明清时期便径直用“商人”称呼研究主体；讨论清末民初后则多根据阶级分析法，将工商

业者归入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亦有称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此种分析明显带有先入为主的政治判断，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颇为不利。尤其是“资产阶级”一词，由于其概念范围甚广，把党人、军人甚至学生等政治旨趣相差甚远的群体均包括其中，所以笔者认为这个词语最不适合用作分析商人的概念。近十多年来，这类状况有了改观，一些论者开始使用具有限定意义的替换概念来指代商人阶层，如“早期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等，虽然这些替换词语能起到一定的修正作用，不过其本质仍未跳脱“资产阶级”的概念框架。另一个目前使用甚为频繁的词语“绅商”，因其界定不易，且难以分清“绅”与“商”的区别，其实亦不能滥用。^{〔6〕}

笔者认为，讨论某一历史主体最好直接使用当时社会上惯用的称呼，或者他们自己所使用的名词，最好不要使用带有褒贬色彩或者意识形态成分较浓的词语。如果后来的研究者一定要用新概念来对某一社会群体作归纳，那么，这种归纳不应出现众多指代不明或者有“史料前预设”的问题。^{〔7〕}因此，笔者径直用“商人”这一中性概念来指称本书的研究主体。

本书中所指的“商人”是一个泛指性概念，其定义则以民初所颁布之“商人通例”为准。^{〔8〕}不过，笔者认为在讨论近代商人问题时，应把一些虽然厕身于商界，但其主要活动却在政界或者党军界或者学界的人和普通商人作适当的区分。就其主流来说，商人自然是以经商为其主业，其兴趣和理想亦在其中。不能把一些暂居商界的党人、政客作为商人的代表来举证。甚至“商客”也不能算作民初中国商人的主流。^{〔9〕}

国内外学者讨论商人与政治的问题，多喜欢从商人组织入手。这固然有其研究的方便，亦能带来许多的启发，但是问题可能也不少。此种“集团分析”，有时会因取证的难度而容易将一些个人的行为当成是集体的行为。即使作者确实是使用了“集体证据”，但可能会忽视团体可能受个人或者派别的操纵。论者可能因过分重视个别团体如商会，而忽视其他商人团体，或者更多商人个体的表现。尤其是在处理商人与政治关系的主题时，此种问题对观点的影响尤其大。笔者将尽量从个体出发，同时注意在具体的政治事件中组织与个人态度的差别。

从“上海”到“江浙”

讨论“商人与政治”之类的大题目，“总体论”的计划往往是不现实的，建基于特定时空的个案考察方能更清晰地展现历史。笔者将以1911～1927年的江浙地区为考察对象，先看看晚清以来该区域内社会变迁的态势与商人的变化，再分章对近世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革命、战争、民族主义运动）对社会的冲击及商人的反应做具体研究，然后分析政治力冲击下商人所出现的种种变化。^{〔10〕}

以前的学者讨论中国的商人与政治，多以上海为中心，或认为上海具有代表性。^{〔11〕}但是在近世中国，上海却是一个最为独特的城市，其政治化、商业化及国际化程度均是其他都市不能比拟的。处此环境中的上海商人又如何能作为中国商人的代表？论者以上海为讨论中心，笔者认为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史料的原因，研究上海，史料容易搜集；

另一个原因则是理论框架的影响，由于上海是一个异质性很强的城市，各种形态的商人均可找到。更因为此地的商人受“政治场”的影响往往较大，^{〔12〕}其行为也容易观察到，采用不同理论框架的研究者或许均可以找到其所需的例子，所以上海便成为学者们论述的焦点。但是，如果我们将视线投向上海以外，便会发现上海可能并不能作为中国的代表。

由“上海中心论”出发，一些学者可能会在潜意识中将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对立起来观察，^{〔13〕}造成对中国历史割裂的认识。其实他们所说的“沿海”又主要局限于上海一地。这种划分，即使对于他们所指称的“沿海”来说，也因过分重视那些与西方经验类似的现象，忽视了相同的时空背景下发生的其他基本事实。笔者虽然赞同区域史的研究取径，但是在“近世商人与政治”这一主题上，却不认为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存在本质性的差别。^{〔14〕}笔者选择江浙区域做此个案，主要是基于史料的熟悉与自身的了解，并非认为江浙区域有着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历史脉络。当然，即使是同一事件，各地的历史经验亦不尽相似，江浙地区更因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区位，^{〔15〕}在许多方面均与其他地区有显著不同。但这种历史表象方面的差异并不能掩盖在一些问题上基本脉络的相似。

本书中，“江浙商人”主要指在江浙两省范围内从事营业活动的商人，包括江浙本籍商人及外省旅居商人在内。选择“江浙商人”为讨论主体，首先是因为江浙两省在地理上的密切联系、历史行政上的归属以及区域文化上所拥有的众多共同点，使得人们在习惯上便常以“江浙”合称。^{〔16〕}江浙民众在心理上亦曾承认此种联系，这可由历史上以及海外至

今犹存的许多以“江浙”命名的同乡会馆得以证明。“江浙商人”此一概念本已存在于众多的文献之中。其次，江浙两省间商品、金融、信息、人员的频繁流通，使得他们实际上存在某种共同经济利益。在开拓外埠市场时，江浙商人往往因地域文化的相似更易联成一气，两省以外的人便自然把江浙两省商人视为一体。这种共同纽带因为五口通商后上海崛起而得到极大的强化，上海成为江浙商人最大的事业基地。所以，在经济上江浙商人的概念可以成立。不过要说明的是，采用此一相对化概念并不否认两省商人之间激烈的商业竞争和各自具有的独特性，更不认为他们是一个绝对同质的群体，而是从他们的基本关怀着眼的。另外，选择江浙商人作为讨论对象，也是想与以前许多学者以上海为中心所做的研究作一比较。在他们的著作中，江浙两省商人群体经常也被冠以“江浙财阀”“江浙财团”“江浙资产阶级”“江浙金融资产阶级”“江浙帮”等其他名称。这些概念如果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未尝不可，但如果把它们泛化，作为两省商人群体的普遍性概念则似乎不妥。因为这些概念均附加了额外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成分，容易产生误导。使用“江浙商人”亦是为了尽量减少历史描述中的主观成分。

什么是“政治”？

近世中国商人与政治关系密切，商业发展与政治变革息息相关，商人之事业更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同时政治变迁亦加剧了商人阶层的复杂化，近世政治党派甚至渗透进商人社团而影响到商人的活动。那么，“政治”是什么呢？